



历史季采编团队：
林秋云、葛君、王婧娅、李云波
整体设计：夏莉佳 视觉音频：李静、赵燕磊

抗日战争与中华民族的复兴



苏智良
主讲嘉宾

现任上海师范大学教授,人文与传播学院院长。1978-1985 年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本科、研究生,获历史学硕士学位。1985 年至上海师范大学执教至今,1996 年晋升教授。1991-1993 年在东京大学担任外国人研究员,1998 年在香港中文大学担任客座研究员。其现为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博导,专门史博士点带头人,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主任、都市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兼任上海历史学会副会长、中华日本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社会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现代人物研究委员会主任、中国城市史研究会副会长等。主要研究方向为上海城市史、黑社会和毒品史、抗战与中日关系、慰安妇等,被誉为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第一人。



张云(评论嘉宾)

复旦大学历史学硕士,现任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军事历史研究》主编,大校军衔。兼任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常委、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会长等。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通史、军事思想和军事史学理论等领域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发表著作 16 部,论文 100 余篇。出版《中国历史命运的大抉择》等 20 多部著作。



林牧茵(特约主持)

现任上海广播电视台《新闻夜线》、《道·理》主持。1994 年考入北京广播学院播音系;1998 年进入上海电视台;2008 和 2012 年分别从复旦大学国关学院国际关系专业获得法学硕士和法学博士学位。2012 年 9 月起,在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从事博士后研究。主要研究方向为媒体与政治、中美新闻教育发展中美关系研究等。曾主持《上海早晨》、《新闻报道》等节目。

抗战史研究：国内外皆有新论

抗战史研究始终是史学界长期研究的重点,今年时值抗战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该领域已取得一些全新研究成果。

国内学界

老问题、新史料并行探讨

国内史学界对中国抗战的研究长久、广泛且深入,其中既有对老课题的补充研究,又有对新问题的开拓性探讨,而随着大批新档案资料的发现,以往一些已定史论亦得到进一步印证和补充。

老问题与新结论。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划定及地位问题历来是史学界争论的焦点。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员戚厚杰认为,太原会战中,八路军全程参与指挥并战斗,表明其在太原失守前的抗日斗争为正面战场作战。齐齐哈尔大学教授于耀洲则认为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尽管国民党的正面战场地位与作用下降了,但仍然是对日作战的重要战场。中国社会科院研究员汤重南则将视域放宽,指出除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外,中国抗战还存在一个国际战场,应加强对该领域的研究。

新视角与新结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外交及经济政策是抗战史研究的重点,其总体特点为:体现统一战线的要求,并服务于全民族抗战的大局。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黄道炫指出,统一战线及统一战线形式下的群众组织和群众运动是抗战初期中共在华北扎根、发展壮大的重要途径。深圳市史志办公室主任黄玲则认为,抗战期间中共不仅发展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长期关系,也开始探索与美英等国的交往,并以此化解国共危机、巩固统一战线,表明了中国对国际关系认识的成熟。山西大学历史系教授岳谦厚则就经济问题进行探讨,指出在中共经济政策的影响下,晋西北乡村内部社会经济结构及运行模式发生了变化,但其分析指出,该地区的主要经

济形态依然是传统的自耕农型小农经济,只不过“中农化”趋向更加明显。

新史料与新结论。近几年随着一批新的档案资料的开放,国内史学界在日本侵华暴行、抗战外交等方面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2014 年《铁证如山》一书收录了长春档案馆新发现的 89 件侵华日军档案,涉及日军强征“慰安妇”、向 731 部队“特别移送”人员、残酷奴役劳工等内容,对以往的日军暴行研究形成有力补充。而随着《蒋介石日记》、《宋子文日记》等文献的面世,中国学者对抗战外交问题亦有新的结论。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王建朗、武汉大学教授胡德坤认为,中国在走向政治大国的过程中始终有着自己的积极思考和筹划,在处理中美、中英等关系中并非一味被动,而中国对抗战做出的突出贡献确保了其大国地位的确立。复旦大学教授吴景平则通过对蒋介石日记的解读,认为蒋作为战时体制中最高、最后的决策者,虽然其对抗战曾有过消极的态度,但最终守住了坚持抗战的底线,为巩固抗战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

国际学界

反思“欧洲中心观”

除国内史学界外,西方国家对中國抗战史的研究也取得新进展,尤其对以往“欧洲中心观”进行了反思,对中国抗日战争史进行了多视角的重建。

新史观和新意义的界定。英国牛津大学拉纳·米特教授的《中日战争 1937-1945:为生存而战》被西方学界视为中国抗日战争总体研究的突破性成果,其认为二战中中国作为欧美的盟友,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该问题长久以来却未得到西方社会和学界的重视。美国学者弗兰克·迈克瑞的《帝国在南中国的冲突:同盟国代理人与日本的战争(1935-1941)》则首次提出“代理人战争”之说,意为中国在抗战中扮

演了同盟国代理人的角色,有力牵制了日本对苏联及英属东南亚可能的图谋。

新视野和新视角的扩展。一方面,以往西方学界在论述抗战期间中国政府的作用时多强调中美关系的主导性作用,而缺少对中国内部政治力量的探讨。剑桥大学汉学教授方德万则指出,应多关注国民党的军事史和战争史,将其作为国民党历史的中心。加拿大学者赖小刚则就中共与其他政治力量的合作与冲突进行了探讨,认为抗战期间中共在山东的成功,与日本及国共两党的战略有关,是抗战时期中国内部不同力量博弈的结果。另一方面,以往战时中外关系研究多强调中美、中苏之间的合作关系,近年来有学者亦开始关注战时其他各国在华关系,如弗兰克·迈克瑞梳理了 1941-1949 年间的中加关系,认为二战前两国并无外交,20 世纪 40 年代初为应对法西斯,二者才展开合作。

微观与宏观的结合。曼彻斯特大学讲师穆尔的《记录战争:士兵笔下的日本帝国》,利用大量中、日、美士兵的日记、书信等资料,论述了国家话语、大众传媒和军队对士兵战争认识的影响,探讨了以上三者宣传工作的机制和得失。除此之外,西方学界近年来亦越来越关注普通战士、妇女、工人、百姓等小人物的研究,例如李丹柯教授的《重庆回声:战时的中国妇女》,即从“个人生命经验的微观角度,重新书写抗战”。

除欧美学界外,日本进步学者近年来也逐渐对中国抗战史研究形成新的认识,如笠原十九司考证了日本社会对南京大屠杀的“争论”历史,指出南京大屠杀否定派所持论据是不合理的。吉见义明和林博史教授则对日军的“慰安妇”制度进行了披露,强调日本政府应对其负战争罪责。这些进步学者的观点有助于改变日本人民的近代史观,揭露日本当下的右翼行为。

(本版整编 李云波)

二战期间,上海这座极具包容性的东方城市是世界犹太难民避难逃生的“诺亚方舟”。1930 年代德国纳粹掌权后实行大规模的排犹政策,在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对犹太难民关闭大门的时候,中国人民和上海这座城市于 1933—1941 年间在虹口提篮桥“无国籍难民限定居住区”中接纳了近 3 万名犹太难民,直至 1945 年战争结束,他们中大多数得以幸存。中、犹两族人民在战胜期间共患难、同生死的经历,是世界文明史及上海近代史上的光辉篇章,当为世界人民咏念。至今,犹太难民曾生活过的“提篮桥历史文化风貌区”仍保存完好,是中国境内唯一一个能够反映二战期间犹太难民生活的历史遗迹。

对于上海犹太难民区的历史,国人尚所周知,然而对于另一处难民保护区——南市难民安全区,却鲜有人知悉。南市难民安全区为法国神父饶家驹所建。饶家驹(1878-1946),原名 Robert Charles Emile Jacquinot de Besange。1913 年来上海从事传教及外侨儿童教育活动,其后广泛参与中国义捐慈善事业,1937 年淞沪抗战爆发后发起设立南市难民区,三年间保护了近 30 万中国百姓,成为南京大屠杀期间由德国人拉贝领导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以及此后汉口、广州乃至法国、德国等地设置安全区的效仿样板,为二战后日内瓦第四公约中关于战时保护平民规则的确立也做出突出贡献。2014 年 11 月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曾发起召开国内首次“饶家驹与战时平民保护”学术研讨会,得到中外学者及大量媒体的广泛关注和报道。

苏智良于 2014 年组织召开学术会议时曾倡导发起“在豫园——城隍庙一带建立饶家驹及难民区纪念设施的倡议”,号召在原南市难民区旧址建立纪念碑、纪念馆等,以咏念饶家驹的光辉事迹。今年是抗战胜利 70 周年,该纪念事宜已陆续筹备,初步拟定《南市难民区纪念碑揭牌仪式及研讨互动方案》。

上海犹太难民保护区,是二战期间中国人民为躲避欧洲排犹主义及战争的犹太难民提供的“诺亚方舟”,而南市难民区则是在上海的外侨为避身中日战争的上海人民而提供的“避风港湾”,二者虽主体不同、对象不同,但交相辉映,意义同等重要,足堪永垂青史。为此,在今年 6 月初上海市政协召开的“推进本市红色文化资源整合”专家座谈会上,苏智良教授建议:将虹口提篮桥犹太人难民区和南市难民区“打包”申请世界文化遗产。其认为上海作为全球性城市,至今没有任何一项世界文化遗产,该申遗建议是有必要的;其次,两大难民区均具有世界性的题材和意义,南市难民区还作为“上海模式”被纳入《日内瓦公约》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程,具备申遗的条件;最后,两大难民区原有建筑至今保存完好,申遗有助于保护上海的城市文脉,传递上海的城市精神。

目前,申遗工作正有序展开。

南市难民安全区
犹太难民保护区

打包申遗